

杨度《金铁主义说》中的国家建设方案

姜治齐

[内容摘要] 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的君主立宪方案的战略逻辑在于，由于认定沙俄是当时列强对华均势下的最不稳定环节，其侵占蒙古、回部地区的强烈企图一旦实现，将导致列强以中国为战场实施瓜分，重建均势。因此，蒙、回、藏地区能否保全关系到新生中国国家的生死，民族问题从而成为新生中国国家建设目标下的关键问题。由于杨度认定当时蒙古族、回族、藏族对中国的认同关系建立在其对清廷君主的服从关系上，君主立宪政体就成为他认定的救国方案。可以说，在杨度的思想体系中，世界局势与地缘政治是思考中国国家建设方案的基本前提，民族问题、政体问题都必须被放置在国家目标下、地缘政治格局下加以考量。

[关键词] 民族；国家；地缘政治；政体

杨度晚年曾对夏衍说过这样一番话：“我平生做过两件大错事，一是辛亥革命前，我拒绝和孙中山先生合作……二是我一贯排满，但我不相信中国能实行共和，主张中国要有一个皇帝来统治，这件事直到张勋复辟后，我才认了错。”^①这些关于杨度同志的回忆，以《杨度同志二三事》为题，被刊载于1978年9月6日的《人民日报》。不难发现，“一贯排满”这个词放在杨度身上显得如此格格不入。1907年，在清末预备立宪的关键时刻，杨度在其创办的《中国新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金铁主义说》，他在文中细致辩驳某些革命派的排满革命主张何以不可取，从而引发了其与章太炎的经典论战。学界一般认为，杨度是晚清“大民族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倡导以文化为纽带实现中国境内各民族一体融合，发“中华民族”之先声，与革命派排满的族裔民族主义截然相反。^②那么，我们该如何认识这个“一贯排满”的杨度形象呢？是口述者的个人偏好？还是杨度晚年的自我修正？本文认为，这看似矛盾的杨度形象实际暗示了杨度思想中国家与民族问题的复杂关系。简单来说，民族之所以在杨度的思想体系中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在其所处的晚清中国的地缘政治局势下，民族是否团结不仅关系到能否保全既有疆域，而且关系到新生国家在帝国主义瓜分威胁下的生死存亡问题。民族问题由此与国家问题紧密相连，从而成为杨度政治思想中的关键一环。就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所呈

^① 夏衍：《杨度同志二三事》，载《人民日报》1978年9月6日，第3版。

^② 例如：郑大华认为杨度通过将民族看作“文化民族”以配合其“五族君宪”的国家方案，详见郑大华：《论清末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理论上的分歧与争论》，《民族研究》2022年第3期；王锐认为以杨度为“文化民族”论的代表与章太炎的“历史民族”论截然相对，详见王锐：《历史叙事与政治文化认同——章太炎的“历史民族”论再检视》，《人文杂志》2020年第5期；干春松同样以“文化民族主义”标识杨度的民族主义思想，但他也明确注意到杨度《金铁主义说》对现实政治与俄国问题的关注，详见干春松：《文明论视野下的民族与国家（下）——章太炎、梁启超与杨度的争论》，《现代哲学》2021年第4期。

现的思想体系来说，其对民族问题的思考并不能被简单框限于“大民族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而与其对时势，尤其是俄国问题的思考密切相连。对时势的体认与分析不仅是杨度民族主义思想与国家政治思想的基本前提，也是打通两者关系的重要环节。离开杨度对世界局势的分析及对中国地缘政治状况的思考，我们就无法认识其民族与国家思想的真正内涵。

一、“文明之国”与“野蛮世界”

就近代中国有关国家与民族关系的讨论来说，1898年是一个关键节点。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流亡海外，对清政府深深的失望以及对自上而下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改良方案的怀疑，使得一种对国家与人民关系更为激进的理解开始形成。倾向于将“人民”视为优先于“国家”存在的“民族”范畴开始出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之中。与此同时，菲律宾独立战争（1896—1898年）、美菲战争（1899—1902年）、布尔战争（1899—1902年）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行动进一步促进了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与民族关系问题的争论。^①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国家主义者强调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增长的经济与军事力量、日趋隐秘的支配手段的威胁，使得国家主权对于中国在国家间竞争愈演愈烈的世界局势下生存下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②而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虽同样看重主权的重要性，但将“民族”视为根本重要者与主权的载体，强调殖民主义的威胁，并通过将满族视为同样的殖民者否认清廷政府的统治合法性。^③随着1905年端方、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立宪成为一时讨论之风潮，国家与民族关系的争论自然地延伸至以何者为主体、以何种形式建立立宪国家，而杨度的《金铁主义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在《金铁主义说》中，杨度从一开始就把中国的国内问题放在世界形势的背景下加以讨论。杨度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正身处一个建立在文明等级划分基础上的、以帝国主义列强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之中。在这个“文明世界”里，“文明”实际上只存在于国界以内，自由平等只服务于本国公民，而对国界以外之人不仅无平等之观念、友善之态度，且视之如仇雠。在这个意义上，杨度虽然接受了社会进化论和文明等级论的理论前提，但并不掩饰自己对列强所谓“文明世界”实际之偏狭的讥讽：

然则今日之世界究为何等之世界？或者不察，动称曰文明世界。虽然，今之世界果文

^① 卡尔·瑞贝卡对中国民族主义话语形成过程的分析给予了我们一种世界视角，通过她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并非天然地与国家主义绑定在一起，而是在既包括欧美也包括亚非拉的广阔世界图景下才逐渐融合。参见〔美〕卡尔·瑞贝卡：《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高瑾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② 梁启超在这一时期的许多著作都渗透了其国家主义思想，如《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1901年）、《灭国新法论》（1901年）、《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1903年）、《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1903年）。

^③ 值得强调的是，章太炎的“历史民族论”并不否认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其同样将多元种族纳入其所设想的多民族社会之中。“又况吾党所志，乃在于复我民族之国家与主权者，若其克敌致果，而满洲之汗，大去宛平，以适黄龙之府，则固当与日本、暹罗同视，种人顺化，归斯受之而已矣。岂曰非我族类，必不与同活于衣冠之国，虽于主权之既复，而犹当弊面剃刃，寻仇无已，以效河湟羌族之所为乎？若是者，其非宗法社会亦明矣。”（详见章太炎：《〈社会通诠〉商兑》，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徐复点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47页。）其与国家主义者的真正分歧基于对国内外局势的不同判断以及对帝国主义政治秩序的不同态度。如汪晖所说：“章太炎批判帝国主义（‘金铁主义时代’）的宿命论，拒绝在文化、历史和政治领域服从‘经济战争国’的逻辑，因此，他对‘中华民国’和中华民族的全部要义就在于拒绝按照‘经济战争国’的模式及其‘金铁主义’逻辑来设计未来中国的政治蓝图。”（详见汪晖：《世纪的诞生：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146页。）

明与否，是亦一问题也。欲解决此问题者，势不得仅据其所以待我者观之，而当即各国之内部分所以为国者观之……盖彼等仍以其国为一小世界，有如吾国人往昔之观念，而人类平等、彼我如一之真正世界观念，殆无之也。其所以微异者，则中国人本不知有大世界，而误认己国为世界；各国人乃已知有大世界，而偏以己国为世界，其性质殊而其无真正之世界观则一。彼等尝笑我之陋，我等亦何不可以笑彼之狭乎……自吾论之，则今日有文明国而无文明世界，今世各国对于内则皆文明，对于外则皆野蛮，对于内惟理是言，对于外惟力是视。故自其国而言之，则文明之国也，自世界而言之，则野蛮之世界也。^①

杨度对列强标称的由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象征的、主权国家间可以进行平等交涉的国际秩序有着清醒的认识。国际法实际只适用于以强大军事实力为保障的国家之间，其目标并不是以平等的国际法权定义和处理“民族-国家”间的关系，反而恰恰是为列强在世界范围内的军事与经济利益冲突提供外交规范。强国与弱国之间没有外交，也无所谓“文明”。国际领域的真正面目是列强争夺霸权的实力关系、大国协调机制和强国与弱国间的不平等关系。对这一认识，杨度写道：

凡文明国之国内法，试一取观之，其于一国之人，无不以自由、平等为原则，人人自由，人人平等，准是而实行之，无恃强力以从事者。呜呼，真文明矣。反而观国际法之所规定，与乎世界各国之所实行者，比而观之，则两强相遇，兵力在后，乃有国际法可言。若夫一强一弱，则弱者直可谓无言国际法之资格……法由强国而立，例由强国而创，世界各国所谓博士、学士，乃取以为著书讲学之材料。其所谓法者不过如此，所谓例者不过如此。^②

既然在这个建立在文明等级论和国家实力准则下的世界秩序中，当时的中国不具备与任何列强平等相处的地位，那么在大国协调、中国势弱的背景下，中国的出路便与列强对待中国的战略态度密切关联。杨度意识到列强经过长期在华斗争，在当时形成的“保全支那领土、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共识实际是将中国内部划分为不同的势力范围，以经济侵略为目的，暂不求土地之瓜分。因而，尽管俄国觊觎中国领土已久，但在这一国际局势下亦不得不收敛侵占土地之野心，中国暂得喘息之机。杨度所思考的中国步入世界的战略方案便在这一背景下展开。既然国际社会充斥着残酷的生存斗争，那么国家力量的提升自然是当务之急，但是杨度并不认为当时的国家竞争仅仅取决于军事力量的对比。1905年9月5日，日俄双方在美国签订《朴次茅斯和约》，宣告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利结束。这场爆发在中国土地上的列强战争深深刺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感情，但同时日本以弱胜强的“成功”也给当时在日本留学的杨度以重要启示。杨度指出，当今之世仅有军事实力而无经济实力依旧不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主权国家间的战争已从单纯的军事斗争转向军事斗争与经济战争互为表里的时代；俄国军力虽然强大但国内宗教、政治、种

^① 杨度：《金铁主义说》，载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7—218页。

^② 同上文，第218—219页。

族等方面矛盾丛生，经济发展迟缓，内部治理无力，因而不能战胜崛起未久之日本；普鲁士以铁血主义统一德国，但在日俄战争之后，亦转向强调经济竞争实力、重视经济侵略的国家战略；中国必须两手都要硬，以“经济战争国”为转型方向才能真正立足于世界。^①

二、“内外皆轻”与“不负责任”

生存与竞争的第一需要既已明确，杨度给出的应对战略也清晰了——对内以工商立国，以扩张民权为基础；对外以军事立国，以巩固国权为目的。在根据世界大势将宏观的国家政治战略立定之后，杨度开始进行中国内部政治社会的具体分析。在杨度看来，巩固国权在当前局势下固为根本大计，但在次序先后上，扩张民权才是中国的第一要务。究其原因，当时的清政府实为不负责任之政府，无力完成自上而下的国家建设任务。对此，他在《金铁主义说》中阐述道：

夫吾之主义，苟真为适于世界之生存者，则不仅在野者宜以此提倡国民，即在政府亦宜抱此以为大政之方针，外而使国权之日张，内而使民权之日起，以求金铁主义之日发达焉。此本政府之天职，而人民之所以贵有政府者即在乎此。

而今吾国之政府则何如？以言乎对外，则为送礼之政府。除承诺他人条件以外无所事事，求其以自动为本国争回一寸之权利，不可得也。以言乎对内，则为偷钱之政府。除窃取人民财产以外无所事事，求其自动为民间兴起一寸之利益，不可得也……

故曰中国政府之专制，亦非野蛮专制也。虽然既非开明，又非野蛮，是为何等专制？曰：吾无以形容之，为特创造一不理论之新名词，谓之放任专制。中国政府者，蒙昧之政府也，惟其蒙昧，故不开明。中国政府者，消极之政府也，惟其消极，故不野蛮。彼因蒙昧而益消极，又因消极而益蒙昧，合之以成一放任之现象，此中国之所独有，而他国之所皆无者。一言以蔽之曰：不负责任之政府也。^②

杨度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清政府正陷入“内外皆轻”的尴尬局面。对于清朝来说，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首先在地缘上，清朝在遇到西方挑战前，在东亚地区少有紧张的地缘政治压力，因而其几乎没有扩张政府与财源的动力。其次在财政上，清政府的传统财政构造是一种“低度均衡体制”^③，这一体制的特点是以田赋为主，而依靠纳税人口巨大来获得相对充足的财政收入以维持较小规模的官僚机构和政府开支。而洋务运动以来，汉人官僚集团强势崛起，实力督抚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极大地掌控了地方。这虽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战争赔款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但也造成了中央与地方互不信任、牵制掣肘的尴尬局面。彼时，地方掌握财权、事权使中央失去对各地财源、行政的控制，但同时，中央以人事否决权牵制地方履行事权。杨

^① 参见杨度：《金铁主义说》，载刘晴波主编：《杨度集》，第220—224页。

^② 同上文，第236、242页。

^③ 参见李怀印：《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47—63页。

度对这一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

故今日政府商部不办商务之事，外部不理外交之事，惟坐食而已矣。以为有权而不知用，亦不尽然也。然则权在督抚乎？此又不然，督抚不得中央政府之承诺，又一事不可为也。昔胡文忠有言：政府不得明白，亦不可使之明白。此何以故？中国政府对于各省，固非能以上下级官厅之制度发号施令，命地方长官执行，如各国内阁对于地方团体之所为也，惟能立于批评各督抚之地位，交军机议、交各部议，以论说持其短长而已。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此胡文忠之所以为此言。然中央政府何以能如此，则以用人之权又在中央，于各督抚一纸去之而有余。故外人虽评我十八省为十八国，然实无稳固之职权，故谓权在督抚亦复难言。

……然则人人皆无权，权果何属？曰人人有权，人人无权，各有一分而相牵制、相推诿，以为放弃责任之地步，则乃中国之真相矣。^①

在政府不负责任，政治社会生活出现大范围权力真空的情况下，杨度认为中国的人民群众同样消极，既没有主动的基层自治倾向，也没有试图同政府争权的行动，因而不乏悲哀地感慨道：“中国政府而至于为不负责任之政府也，实中国人民先已为不负责任之人民也。”^②由于看到当时人民普遍缺乏现代政治参与能力与意识，杨度引用甄克思在《社会通诠》中的图腾-宗法-军国三阶段社会进化论，强调中国已非常接近军国社会阶段，只是由于存在压抑个人政治能力的家族制度，因而才积弊不前。其用意一方面是批判中国社会的落后性，但同时不无以“非常接近”的说法激发人民的政治意识，打破阻碍个人本位的国民社会形成的家族本位思想，使人民转变为具有政治能力、自觉承担起政治责任的国民。

至此，杨度的金铁主义核心是锻造国家、改造国民。然而中国广土众民、民族多元，各族之间不仅语言殊异、宗教信仰不同，而且还有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从宏观国家战略目标并不能自然引申出中国要建立囊括汉满蒙回藏等多民族现代国家的国家图景。因而，正是在进一步明确中国现代国家的具体图景的目的下，杨度展开了对民族主义、民族关系以及一些革命派排满主张的讨论与回应。

三、“民族主义”与“立宪政体”

杨度使用的民族主义概念延续了甄克思在《社会通诠》理论框架中将民族主义与宗法社会绑定的概念定义，“宗法社会，则以民族主义立国，其在种人，则对于酋长而负责任；其在族人，则对于族长而负责任。所谓酋长、族长，皆君主也。民族之观念深，而国家之观念浅，故其人亦但可称为种人、族人，而不能称为国民”^③。由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进入军国社会阶段，凝聚国家认同的最大阻碍。在他看来，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清廷为了躲避儒家“以臣弑君”的

^① 杨度：《金铁主义说》，载刘晴波主编：《杨度集》，第 239—240 页。

^② 同上文，第 243 页。

^③ 同上文，第 259 页。

大义诛伐，维护自身统治合法性所制造的“种主即国论”，即认为满人入关是“以国灭国”，中国于是从汉人国家变为满人国家。他指出，究其根本，这是满人身处宗法社会阶段，持民族主义观点，无国家主义概念所导致的荒谬之论。他在《金铁主义说》中对此分析道：

夫种主即国论者何？主即国家，种即国家，主而异种，即更国家之谓也。此种主即国论之所由成，乃利用儒家君臣大义说以为之干柴，利用史家一姓正统说以为之煤油，利用俗学君主国家说以为之火引，夹入满人之种族国家说以为之大风，以此四元素合成一种种主即国论，煽起一种不可思议之清议。^①

杨度认为界定国家的核心要素有三点，即土地、人民、统治权。那么同一土地上各个民族的前后更替，占有统治权便不构成国家更迭。因而，曾接受明朝“龙虎将军”封号的满族既为明朝臣属，并非自有一国，其地便属中国土地，其人便属中国人民，其政权便属中国政权。^②而晚清满人尽操汉语、不复通满语的现实，已经证明满族入关以来所采取的排斥汉化的民族主义政策全然失败。在这里，杨度实际上将西方现代国家理论中强调空间维度以在列国并起中界定国家的方式，吸纳进中国传统中强调时间维度、以改朝换代的正统论叙事处理连续性问题的国家观念。

那么在这一背景下，满汉关系应该如何处理呢？杨度认为，首先，既然“种主即国论”为无稽之谈，满人本属中国之一部，一些革命党人排满光复之说在理论基础上就是不成立的；其次，满汉问题作为当时政治争论的核心问题，其症结在人民层面，在八旗制度所产生的一系列弊病，而不在于是否要去除满族君主，即“盖满人之所急者，在于生计自由，而政权非其所竞争。汉人之所急者，在于政权平等，而皇位非其所竞争”^③。杨度认为，满汉问题根源于满汉人民政治经济权利不平等，而之所以存在此种不平等，是因为清朝的民族主义政策将八旗制度作为驻守地方、拱卫皇室的制度基础。因为将保卫皇室、终身兵役的义务强加于满人民众，剥夺其择业自由，因而不得不以在经济上用国家财政保障其低廉俸禄，在政治上以满汉分缺的特别选官制度加以补偿。^④时至当时，八旗子弟既无军事能力履行其军事义务，又被限制自由以满足其生计问题，不仅给国家财政造成了巨大的负担，而且因享有这些特权而不能履行义务，这给汉族民众带来了极大的不平等感。

通过将挑战清帝统治合法性的满汉问题解释为民众权利与义务不平等的问题，杨度提供了在君主立宪政体下解决满汉问题的政治方案。他认为，不论满汉都应该放弃狭隘的民族主义，采纳国家主义，成为平等的国民。由此，不论是国民程度问题，还是满汉问题，都被杨度通过国民参政议政、明确权责界限的立宪政体方案得以解决。然而，在这一时期，杨度的立宪政治方案却并不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方案，而是充分动员“中等社会”力量走自下而上路线的政

^① 杨度：《金铁主义说》，载刘晴波主编：《杨度集》，第269—270页。

^② 同上文，第263—268页。

^③ 同上文，第287页。

^④ 杨度：《国会与旗人》，载刘晴波主编：《杨度集》，第430—444页。

治革命方案。杨度认为，当时中国必先开国会，而后立宪。原因在于，清政府的专制性质决定其不会主动将审核国家预算、监督执政的权力交给国会与民众。而如果不开国会、先行立宪，人民未先形成自己的政治根基，宪法保障人民权利的程度必定不高，国会权力势必不大。杨度对比了英普日三国立宪历史，将之区分为民定宪法、君民合定宪法、君定宪法三类，他断言：“凡国会先于宪法者，其国会权力必多于君主，而宪法程度必高。”^①既然“与其求形式上之宪法，不如求实质上之国会”^②，那么在政治革命的手段方法上，杨度将“立政党”“恃舆论”作为开国会的主要武器。杨度认为，一旦国会的代表制度和责任政府的问责制度依次确立，一方面，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交互渠道就能打通，国家机器就能高效运转，国家的财政收入就能扩大并被妥善地运用于公共事业当中；另一方面，尽管扩大政治参与可能带来不少问题，“且议院之初开也，非失之于腐败，即失之于激烈”^③，但政治参与空间的打开会给人民提供在实践中提高政治能力的机会。此外，杨度还以一种十分乐观的态度看待代表性问题，即“上中社会”能团结引导整个社会，且若其行为违反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就必定被人民所制止。

然而，即便在国家战略层面证明了立宪政体的可欲性，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的形式选择这一当时争论的焦点问题却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杨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紧密围绕着其对当时中国地缘政治局势的考量，并且是其个人政治思想的关键所在。杨度认为，民主立宪在当时不可取的主要原因是：这一方案无法解决其实行过程中必将遇到的两个足以决定中国生死存亡的困难，即“一曰蒙、回、藏人之文化不能骤等于汉人，二曰汉人之兵力不能骤及于蒙、回、藏人”^④。

具体来说，杨度以是否以民族主义为手段将当时民主立宪方案分为两类。就以民族主义为手段的民主立宪派来说，杨度认为，民族主义本属宗法社会，近世国家只有如德国、意大利在同族散落各地的情况下才利用民族主义为手段合小国为大国，中国本广土众民且族群林立，以民族主义为手段则只能起到分离之效。杨度通过民主立宪派以“中华民国”为国名的行为认定民主立宪派是以文化民族主义为手段，实际追求国家主义目的：

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地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此可于假借令意而得之者也……惟彼若主张甄克思之学说，则满人亦将在其外。然民主立宪党所欲成之民族的国家，命之曰中华民国，则是言文化而不言血统，欲合满汉而共组织一民族的国家可以推知。虽彼间有排满之言，然自释之曰：非排满人之为人民者，乃排满人之为君主者；则是自明其非血统的

^① 杨度：《金铁主义说》，载刘晴波主编：《杨度集》，第392页。

^② 同上文，第351页。

^③ 同上文，第343页。

^④ 同上文，第368页。

民族主义，而特采文化的民族主义为手段，以解决蒙、回、藏之问题，而达民主主义之目的耳。^①

还原杨度所谓“文化民族主义”的文本语境，我们不难发现，其运用清代今文经学的“夷夏相对论”将中华民族定位为文化民族的目的，是定义其论辩对手的民族主义概念。而在杨度本人思想中，民族主义作为宗法社会的产物，以之为主义是逆历史阶段而行，以之为手段同样不合中国之时宜，因而此一论述实为其对民主立宪派的理论武器，而非其本人所服膺。^②

在界定论辩对手的概念的基础上，杨度就现实政治的推演进一步抨击了民主立宪派以文化民族主义为手段的可行性。他认为，平等的民主原则与文化水平现实差异的碰撞，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蒙回藏族人民的差别对待。杨度认为，蒙回藏人处于宗法社会阶段，国家观念本不发达，会先入为主地接受既有统治关系中的国家概念，知有清朝大皇帝而不知何所谓民主、共和；而且，蒙回藏人民各聚居一处，旧的统治关系一旦崩溃，其在新的统治关系中又处于与满汉不平等的地位，则必生“排满略汉之心”。在这种情况下，民主立宪派若采取“压制策”，即以在一国之中民族等级制度区别对待满汉与蒙回藏，必将导致其激烈的脱离倾向，而新政府又无足够强大的军事实力以建立新的服从关系，那么内部分裂的结果将不可避免；若采取“分立策”，即允许蒙回藏分立，任其来去，自主选择，这在安全的地缘政治环境下虽然也是一种选择，但在当时的局势下则断然不可。杨度甚至为之设想了一种“中国门罗主义”，即效法美国在国际社会公开宣称将蒙回藏等地纳入自己的保护范围，将对蒙回藏等地的殖民行动视作对中国的挑战：

使新民主国能致门罗主义，慨然为一大宣言于世界曰：今后世界各国，有欲于东亚细亚大陆得领土者，视为乱中华民国之平和。各国若因此宣言而遂群缩乎也，则新民主国虽无保护蒙、回、藏之名而有其实，蒙、回、藏可以得安，而新民主国亦可以不亡矣。若其不然，则各族之相率俱亡可立而待。^③

对于不以民族主义为手段的民主立宪派来说，杨度认为不以民族主义为手段，则必须秉持民主精神赋予各族人民以平等地位，共开国会，是为“联合策”。然而这一方案在他看来同样不可行。首先，语言问题难以解决。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写道：“吾知主张联合蒙、回、藏以行民主立宪者，若议员不必用中国语，则是于开设国会之后，促汉、蒙、回、藏之分裂；若议员必用中国语，则是于开设国会之先，促汉、蒙、回、藏之分裂，二者无一可者也。”^④其次，如前所述，蒙、回、藏对中国的向心力源于其对清廷君主的效忠，一旦君主被推翻，服从关系随之

^① 杨度：《金铁主义说》，载刘晴波主编：《杨度集》，第374页。

^② 吴蕊寒指出，杨度与章太炎对彼此的民族主义存在双重误解，“似乎在杨度将‘文化民族’说归诸章太炎的第一重误解下发生了第二重误解。即，章太炎又将‘文化民族’说误当作杨度自己的观点，指责杨度乱名诬史、皮傅已意，舍弃血缘和主体民族主权的前提，空论进夷狄于中华，进而章太炎提出了自己‘历史民族’的主张”。详见吴蕊寒：《国族关系与文野之辨——杨度与章太炎思想比较研究》，《哲学动态》2023年第5期。

^③ 杨度：《金铁主义说》，载刘晴波主编：《杨度集》，第379页。

^④ 同上文，第381页。

解体，而想要建立新的服从关系则需新的征服，而这是当时局势下根本做不到的。

四、地缘政治与“中华民族”

可以说，无论是否以民族主义为手段，杨度认为民主立宪方案在如上所述的客观现实中都是不可行的，因为如此一来不仅将打破列强的在华均势，而且会招来中国的亡国危机。既然如此，那么君主立宪的可行性论证同样需要杨度在时势分析中加以展开。杨度对当时列强的对华战略和中国的地缘政治局势的判断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来自俄国。在他看来，俄国长期觊觎中国蒙古、回部地区，且在日俄战争战败之后，俄国失去在东三省的战略优势，必将加紧对蒙古、回部的图谋。因而，内部分裂的局面一旦出现，蒙古、回部地区一旦脱离，俄国势必进而图之。俄国一旦得手，列强在华的势力平衡则被打破，以制衡俄国在东亚的势力扩张为地缘战略的日英不会坐视，具体地，英国将占据西藏进而进兵四川，海军则由长江潮流与陆军于四川会合，从而掌控长江流域，而日本将占据东三省，以图日英共同拒俄。在此局面下，其他列强为建立新的均势必将以中国为战场，各自割据，内部之分裂终将招来外部瓜分之结果，如此则中国已亡。杨度分析道：

俄若得蒙古，则英虽不欲占领西藏之土地而不能不占领，日虽不欲占领满洲之土地而不能不占领，德虽不欲占领山东之土地而不能不占领，法虽不欲占领云南、广西之土地而不能不占领，英虽不欲占领扬子江流域之土地而不能不占领，如是则中国已亡矣。^①

在这一地缘政治视野下，蒙古、回部的保全不仅是中国能否维持清朝已有的国家疆域问题，更是新生国家能否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压力下得以幸存的问题。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杨度所说的“故中国今日领土之问题，人种之问题，实以蒙古为第一之重要者矣”^②。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杨度判断道：“故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必使土地如故，人民如故，统治权如故。三者之中，不可使其一焉有所变动，一有变动，则国亡矣。故吾尝谓今日中国国形不可变，国体不可变，惟政体可变。”^③

杨度认为，君主立宪相比民主立宪的优势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呈现出来。首先，君主立宪把作为中国对蒙、回、藏统治合法性来源的清廷君主保留下来，不仅能够避免新旧更迭中蒙回藏与中国旧有服从关系的断裂，维持了蒙回藏地区对中国的向心力，而且由于国体未变，君主仍存，政体变革仅为国内政治问题，因而也就避免了民主立宪下新政权需要得到列强承认，而列强以国际法名义横加要挟的危机。其次，君主立宪更少依赖军事力量，实行较易。由于不需要彻底推翻君主，只要合国民之舆论与较少之兵力便足以警示专制政府，迫其开国会。即便失败，也只会导致民众舆论愈加激烈，从而壮大政治革命的声音与力量。而民主立宪想彻底推翻君主

^① 杨度：《金铁主义说》，载刘晴波主编：《杨度集》，第 261 页。

^② 同上文，第 262 页。

^③ 同上文，第 304 页。

制度，必将遭到专制政府的殊死斗争，而且即便战胜又要面对列强环伺、图谋瓜分的现实，所需要的军事力量与流血牺牲不可估量。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杨度对民主立宪方案的否定不在于其理论价值，而是从国家本位的现实政治出发，对于民主立宪可能带来的地缘政治危机深表忧虑。换言之，民主制、君主制对杨度来说都是可供选择的理论方案，不具有不可变易的根本价值。在其国家本位的政治思想中，立宪政体下的君主是提供国家合法性来源的制度设计，但实际的政治运行机制则由责任政府与国会组成，因之“然君主乃立于各族之外，不过为国家之一机关”^①。

在君主制提供的团结功能和代议制提供的吸纳功能的基础上，杨度设想以“文化同化”解决民族问题。具体来讲，即以“通中国语”为选拔议员的唯一标准，不设期限，不立等级，以实现“满汉平等、蒙回同化”的目的。杨度认为，在民主立宪制下无法实行的语言统一政策，在君主立宪制下由于君主提供了团结纽带则完全可行。“虽然，欲行此中国语条件之制，于蒙、回、藏必仍固有之君主、固有之政府，而后能行之，否则必不能，非民主立宪党之欲排君主、废政府者所能剿袭者也。”^②值得注意的是，杨度将“通中国语”作为“文化”的唯一标准，是仅以国会之中沟通方便为目的，并非以汉族或中国传统文化为“文化”的尺度。杨度此处使用的“文化”概念指向的是去民族性的国家政治文化。这一点可以在其“同化”概念中得到印证：“则借君主立宪之制，使举国会议员而行以中国语条件之制。其始也，姑以去其种族即国家之观念；其继也，乃能去其君主即国家之观念，而后能为完全之国民，庶乎中国全体之人混化为一，尽成为中华民族，而无有痕迹、界限之可言。”^③可以看出，杨度的“中华民族”概念是仅就具有现代国家政治意识的国族意义上使用的，其根本目的在于使境内各族人民去除族裔民族主义，携手成为具有现代政治能力的国民，为中国在帝国主义世界秩序下转型成具有竞争能力的现代国家提供社会基础。显然，杨度在当时已经意识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并非特定民族作为历史主体自我实现的“以族定国”过程，而是以国家主权为中心建构国族的“以国定族”过程。

五、结语

杨度曾经以“君宪救国”为己任，也因其君宪方案为后世流行的历史叙事所贬斥。但后来者并不能仅就历史的后见之明与特定的叙事需求将思想者在具体时势中的复杂思考简单标签化归类。晚清中国面对的世界局势波谲云诡，中国面临来自多层次、多方向的现实威胁。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紧紧围绕俄国问题给出自己的建国方案，体现了其对来自陆地力量威胁的深切忧虑。但同时，其在论述中格外强调经济竞争、产业竞争的重要性，以及其在分析俄国问题时从未遗忘的英日同盟，也表明杨度不曾遗忘来自海洋力量的威胁。就杨度的思想体系来说，君宪是因其能够救国而为其所推崇，民族问题、政体问题等一切问题都必须放置在国家存亡的前提下加以考量，从而“排满”“联满”对其来说都不是问题根本所在，其民族主义思想与其说

^① 杨度：《金铁主义说》，载刘晴波主编：《杨度集》，第353页。

^② 同上文，第371页。

^③ 同上文，第372页。

是“文化民族主义”，不如说是国家本位的“国族”主义，如汪晖所分析的，“杨度的‘文化中国’论是为了适应帝国主义‘经济战争国’的局势而设想的国家图景，从而预设了其‘金铁主义’逻辑”^①。当然，杨度接受了西方进化论与文明论思想，以积极效法的态度试图使中国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对民族性、特殊性与中国传统政治价值的估量失之偏颇。可以说，他的思想紧紧围绕着现实政治主权的价值，而忽视了精神领域主权^②的意义。但杨度在君主对于维护民族团结的重要性问题上的见解，在很大程度上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所验证。在从清朝到中华民国的过渡过程中，清帝逊位诏书为南北两大政治集团达成“大妥协”、遏制边疆分离主义、维护国家主权的连续性提供了极为关键的法理基础，^③其“五族合一”的国族主张后来也为革命党人所继承。在这一意义上，杨度又何尝不是“革命的诤友”。应该说，杨度对中国地缘政治环境的观察及其现实政治视野下的民族方案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也证明了离开当时具体的时势我们便不能理解杨度政治思想中最具政治智慧的部分。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生

① 汪晖：《世纪的诞生：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第 146 页。

② 汪晖指出：“对于西方的物质模仿越成功，越需要在精神上获取主权性，因此，精神的领域也是主权的领域，而后者的目标就是确立一个非西方的领域。”详见汪晖：《世纪的诞生：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第 145 页。

③ 关于清帝逊位诏书与“大妥协”的关系，可参见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